

——
八桥恒丰村淤溪河南，江都真武湖滨乡，过去叫“张四娘圩”。圩里有位徐姓富户，有良田百亩，湖田若干。人称“刻薄起家，勤劳致富”。懂得“善用伙计恶用牛”，有时为催伙计早起，一大早就将两只水煮荷包蛋送在了床前。刻薄，多向自家。上扬州办事，起早带晚步行，只花几个钱住旅馆。吃上，开水泡鱼面，半个咸鸭蛋；另半个，用碗一罩，留待下顿。

一日晚饭后，徐富户信步闲走，听得一处房里吹弹歌唱、嬉笑连天，好不开心热闹。心想，是什么人这么有钱，这么快活，过这种神仙的日子？踱至后窗，将一扇窗门轻轻推开一缝，一看，大吃一惊，连连跺脚，大呼，“冲家！冲家！怪不得南圩的田直见其少！”回到屋里，呆坐无语。忽然站起身来，恨恨地说：“奶奶的！不得省头了！”伸手拿过来半个咸鸭蛋，吃个精光。

原来这位“神仙”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大儿子！

他狠狠心把南圩的田划在大儿子名下，将其逐出家门。

未几，此长子便败光了田产，适逢新中国成立，竟成了一名自己动手、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

这位徐富户有个姑娘嫁在我们八桥方家庄。他有个老儿子名徐正业，在姐姐处读小学、读初中、读师范，毕业那年，正遇困难时期师范解散，未能分配就业，响应号召，报名支疆去了石河子军垦农场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。

有一年徐正业回来看望姐姐，来我处玩，我们谈新疆风土人情甚洽，听他

唱西域歌、跳西域舞甚欢，他还抄出几首维吾尔曲调、画出几种维吾尔乐器付我。他育有一对儿女，后来儿子徐永红来八桥读高中，毕业回疆考取昌吉州职业大学。我们曾有音信往来，后来终于音讯渐渺。想来他晚景不会太差。

二

“文革”期间，大队排演扬剧《红灯记》，缺文场，听说我会拉二胡，要我加入，按男劳力出工记分。我说，不是谦虚，我只能自娱自乐自我欣赏，离登台伴奏还差得很远。后来说是江都真武有个琴师，名徐锦章，要我相帮去请。

我跟了大队分管革命文艺的造反派王姓小头头，步行十多里，在真武南头一间三架梁、大约曾是牛房的土墙草屋里找到了琴师徐锦章。屋内，一层土还在东北角地上围了个床形，稻草铺，睡人；锅腔子一个，烧饭；屋内西北角一个灰堆，分明有对着灰堆小便的痕迹。

徐锦章干瘦瘦小，眼已昏花。小时家中富有，人称少爷。少时好玩，用留声机放唱片学拉胡琴，听 he 说是“放坏了一堆唱片”，终于拉得一手好胡琴。田地家产玩光，去到上海一家戏班文场里混口饭吃。解放后回乡，无有妻小，孤鰥一人度日。

徐锦章京胡、二胡都拉得非常出色。他不识简谱，全靠机械模仿、机械记忆；听唱、跟音的伴奏能力特强，或曰已成本能，已内化为音乐素质。

大队干部要我跟他学学，我也想将他一肚子的京、扬、淮剧的曲谱、词牌、过门弄下来。于是，听奏，循音记谱，改定刻写油印出来，皆大欢喜。

我1958年参军服役，部队是南京军区南京公安内卫团直属警卫手枪连。到连队没多久，就两次押解刑期十年以上的罪犯到大西北。

第二次押解近一千名犯人，到兰州后，由于兰州军区部队赴西藏地区平叛剿匪，犯人没有部队接收。军区指示我们将所有犯人直接押送到青海省格尔木市河西金峰农场。

我们运用汽车，经过四五天艰苦跋涉，终于将所有犯人安全押解到了目的地。

当地劳改管教部门指定我们在没有一间房屋，长满杂草的一片荒地上建设农场。我们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。

我们用四面红旗插在四个角，将所有的犯人安顿在这个有红旗标记的圈子里，算作临时监狱，并告诫犯人，走出红旗圈外就算越狱并予加重处罚。

头几天，大伙儿忙着砌锅灶，搭帐篷。白天在草地上巡逻放哨，晚上在帐篷里学习睡觉。经过全体指战员辛勤劳动，一座新的军营，一处帐篷监狱，终于建成了。

我们刚建好营房，格尔木驻军团部的一位作战参谋赶来，报告了敌情。他说：就在离我们营地三十多公里的昆仑山南侧，有一支西藏叛匪，他们持有较为先进的武器，训练有素，可迅速出击。我们的住地，就是他们妄图解救犯人的目标。

连队首长听了敌情介绍，感到责任重大。为了防范敌人的入侵，连长王德重和指导员王东河制定了防卫作战的方案：一旦哨兵发现敌情，需鸣枪报警；一排二排要迅速包围犯室，以防敌人劫持犯人逃跑；三排

四排和连部要迅速占领南北两路山头制高点，阻击敌人进攻。

听取了连队防卫方案后，大伙儿都有了准备。那几个晚上，我们睡觉都不脱衣服，我还把一双鞋放在枕头底下，一有情况，穿鞋比较方便。

这场虚惊

□ 丁长林

这天夜间，我们正在熟睡，突然听到报警的枪声。我在帐篷里穿上大衣，穿好鞋，拿起枪，直奔山头制高点。可是没跑四五米，脚上的鞋掉了。原来我把放在枕头底下的鞋忘记了，穿上了邻床的大个子机枪手何恒庆同志的一双46码的鞋。这么大码的鞋，对于我只穿38码的脚来说，怎能不掉呢？

营房外制高点的山坡路上，满是枯萎的枸杞，枝干上的针刺刺到光脚上，疼痛可想而知，但是，那时由于精神紧张就忘记了疼痛。

在进入制高点阵地时，我还好，棉衣、棉裤、大衣都穿得好好的，没有感到太寒冷。有些战士没有来得及穿棉衣、棉裤，在零下十多度的小山头上，冻得要死。还好，敌情警报很快就解除了。

原来是兄弟农场用几辆马车给我们连队送蔬菜，那几匹马脖子上挂着的铃铛声响，哨兵以为是叛匪马队，所以鸣枪报警。

一场虚惊后，我和何恒庆同志才感到双脚疼痛难忍，但还得忍受着刺痛，一步一步走回营地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和何恒庆忙着清理脚刺。经查看，我们每只脚上都有不少于20根针刺。

何恒庆这人真好，他没有因为我误穿了他的鞋，也让他和我一样经历被枯萎枸杞枝干针刺的痛苦而责怪我。

今年正月初四，正值举国疫情紧张、全民居家隔离的非常时期，二婶风尘仆仆地赶来我家“临危受命”。七天“警报”解除后又和我们一起蜗居在家、足不出户一个月。眼看春暖花开、身心舒朗的日子到了，二婶却要走了。

二婶是我媳妇海安老家的亲戚，她与我媳妇的妈即我的亲家母是妯娌。媳妇称她二婶，我老家高邮习惯上称其二妈。

温馨的回忆一打开，思绪把我带回三年前。2017年元月我刚办完儿子婚礼，家住海安农村的亲家邀请我和老公参加小两口在当地的回门酒，席上一个高高个头、笑意盈盈的妇女抓住我的手，亲切地说：“我是你媳妇的二婶，常年在外做月嫂，哪天你做奶奶缺人手，我来帮忙。”好个善解人意、快人快语的二婶，一句话说到我心里了，好呀，我巴不得呢。

当年金秋十月我做奶奶了，二婶信守诺言，推掉手上订单来到我家。她不分昼夜、衣不解带地抱着我早产的孙女，喂奶、拍背、洗澡、洗衣、做婴儿操，每日还对孙女的食欲、食量、啼哭、体温、大小便观察记录并做好相应处理。忙完宝宝接着又要忙大人的月子餐，每天变换花样、精心搭配、合理营

二婶

□ 俞大农

养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由于二婶付出真心愿劳苦，呵护备至似亲人，大人孩子顺利度过双满月。记得那次二婶因接单匆匆离开，我也没来得及陪她到我居住地宜兴游玩。

今年大年初二老公突发尿结石住院了，正在海安过春节的小两口迅速赶回家。正急得火烧眉毛的我指望他们帮忙呢，结果两人回单位抗疫去了，乱作一锅粥的家谁来烧饭带孙女，又是二婶走马上任了。阿弥陀佛，这下我终于可以跑医院了。

经过一星期治疗，老公出院了。家里井井有条，窗明几净、地板光亮、饭菜飘香。嬉闹活泼的孙女坐在二婶腿上欢呼雀跃，那摇头晃脑的神态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其乐融融的日子又回来了。

感谢二婶给了我们支持和帮助，给了我们温暖和安宁。经过这一场疫情，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除了感悟自由和健康的宝贵外，会更加珍惜亲情、友情。让我们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温柔地待人，也温柔地被人待见。

二婶到家后，我特地打电话邀请，等拨云见日、春和景明时，一定陪她看看山清水秀、驰名中外的陶都，以弥补两次没有游览的遗憾。

我的母校

□ 居述明

我们那个上庄村有点奇怪，一个行政村主要由两个村庄组成，离运河堤近的叫上庄，远的叫下庄。

老辈人把上庄又称西庄，下庄称东庄。这是生于下庄的人乐意听的。我爷爷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奶奶常嘀咕，“充军呢，一天一个西庄。”

我上小学一开始在东庄小学，那是所初小，到三年级，然后就到上庄小学念四、五年级。

不得不承认，上庄才是这个村的中心。那里有集市，平时也能买到肉。有个供销社，有各种布料卖。有个医疗站，里面两个赤脚医生，其中一个独膀子，小孩子去打针，最怕他，他一只手扎针，疼得很。村部也在上庄。

村初中不要说也在上庄。记得班上调皮的学生以上庄的居多，下庄的孩子老实、学习好，这一优势足以使我们扬眉吐气。教我们的老师也多出自下庄，对成绩好的孩子另眼相看，惯得我们自信心逐渐膨胀，似乎也有点瞧不起上庄人了。邻村的孩子也在这个初中读书，他们说老师不是很重视他们。

初中一年级，教数学的老师是个年轻的高中毕业生，女的，算不上漂亮。让我做课代表，我稀里糊涂就做了，收作业，交给老师。

有一天，她心血来潮，非得把作业本数一遍，“嗯？差一本！”

“谁没交”？

我的母校

□ 居述明

我抖抖索索站起来。

“作业本呢？……开学到现在，你竟然一次也没写？”

课代表当然是做不成了。年轻的女老师气得脸通红，把我的板凳、书包往脖子上一挂，滚！

父亲嘴上说，不想上就不上了，回家弄趟鹅养养，晚上，还是去校长家打了招呼。

校长是我爷爷辈，我父亲曾经的老师，也在下庄。第二天，我提着小板凳，背着书包，耷头耷脑地溜进了教室。

读初三的时候，老校长教政治，手里捧着的薄薄的一本书上，贴着好多纸条。他讲得细，考点抓得特别准。

他有一辆“永久”还是“凤凰”牌的自行车。别人都是一只脚踏在踏板上，另一只脚蹬几步，飞身“上马”。他只会硬上，跨上车，一只脚踮起脚尖一蹬，开路。我去镇上参加师范第一轮考试，就坐在车后座上。我个小胆小，不敢跳上去，于是一老一小都硬上，他左脚找了块高点的地方，用力一蹬，引得旁观者一片哄笑。

带我去高邮参加第二轮考试和面试的，是班主任梁老师。他能很帅气地飞身“上马”，我还是不敢跳上后座，无奈，只得炮制老校长的硬上法。梁老师骂我小笨蛋，他一急脸更红了。

前几年，老校长九十多岁寿归道山，没得什么大病，没受罪。梁老师也退休了，我们偶尔还一起喝酒，他洋腔古调的声音依旧洪亮，酒量不输我们几个学生。

如今上庄下庄都凋敝得厉害，初中早没有了，小学也撤掉了。一帮同学撒在了或远或近的地方。

“油炸臭干张”（小小说）

□ 朱桂明

张师傅下岗了，呆在家里生闷气，三天不出大门边。女儿喊他，他不答。妻子唤他，他不应。调皮的小猫也乖巧起来，远远缩在一个角落里，生怕再挨其一脚。

气归气，日子还得过。第四天，他刮了胡子，换上了干净的工作服，走出了大门，去找活干。找了几天，也没找着。都嫌他快50岁了，年龄大。妻子劝他，求人不如求己，你爷爷不是卖油炸臭干的吗，重操祖上旧业总会有口饭吃！

经过半个月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各种准备，张师傅终于挑着担子上街了。他大路不走走小路，闹市不去去郊区，生怕遇见熟人。遇见熟人，神色慌张，连忙避开。避不开的，则低头垂眼，装作没看见。这样做生意，如何做得好？不要说养家糊口，自身都难保！妻子再劝，人到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倒不如放开手脚大干一场。

张师傅想想，妻子说得不错。人到这个地步，生存是第一位的，还顾什么脸面！他决心破釜沉舟了，干脆在自家门口设了个摊

子。他家周围，人口密集，生意果然好了许多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情绪低落，见人总是弯着腰、苦着脸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讨口饭吃，现丑现丑……”妻子又劝，靠劳动吃饭，不偷不抢，哪来什么现丑，挺直你的腰杆做人！

这一次，张师傅还真听劝了。每天下午三点，他蓝粗布长工作服一套，笑嘻嘻地在家门口拉上电灯，设上摊子。“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啦，天空出彩霞呀，地上开红花呀……”他一边哼唱着，一边生起炉子，搁上铁锅。烟雾袅袅，油香阵阵，一片生机。

他家的老臭卤子，严格按祖传秘方配制。里面有黑芝麻、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、盐、酒等。该有的，他一样不少，决不偷工减料。在这种老臭卤子里浸泡过的臭干，炸出来味道纯正，特别香、特别鲜，人一吃就上瘾。不多长时间，张师傅的名声就传开了。每天傍晚，来这里买油炸臭干的人，都排成一条长龙。

他的生意，越来越红火。有人干脆给他起了个绰号，叫“油炸臭干张”。张师傅很喜欢这个绰号，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认可与褒奖。他特地请人做了一面三角形的绸缎幌子，黄底镶红边，用黑丝线绣出“油炸臭干张”五个大字，高高挂在自家外墙的墙壁上。

伺龟

□ 陈飞

当初，我一时兴起要养乌龟，不仅因它是长寿之物，还因它整个冬天都不用进食，感觉可以懒养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，如果没有我和家人的悉心照料，几个小家伙很难死里逃生。

其实，我养龟的这十年中，前几年还是比较顺当的，没有发现它们得过什么病。起初，它们的吃喝拉撒都是在一个大脚盆里，到了夏天气温升高以后，家中弥漫着一股骚臭味。小孩的意见特别大，嚷嚷着要将它们“发配”到乡下去养。母亲只有通过勤换水，来解决刺鼻气味的问题。虽说是我主张养的，母亲反倒成了乌龟的真正“保姆”。

刚开始，几个小家伙或许是厌倦了先前在大自然的游荡生活，对于每天按时喂食的圈养是接受的。时间一长，它们的野性逐渐暴露，经常在脚盆里玩“叠罗汉”。大脚盆的高度是有限的，久而久之，当它们配合得相当默契的时候，不经意间就会溜出去一只。

我养乌龟，最惊喜的莫过于看它们生蛋，那是一段漫长的等待，又是开心一刻。有时，乌龟生蛋就像吹泡泡，一口气能生出好几个来，感觉特别神奇。然而，我最担心的莫过于它们得水霉病。它们正常被圈在收纳箱里，在车库过冬。清明以后，才得以重见天日。五六年前，我发现两只大龟的颈部和腿部，生出了白斑直至溃烂，再严重一些就不能进食了。几番咨询，水产养殖方面的专业人员建

议，最好将自来水蓄在桶里，释放掉一些氯气，再倒进收纳箱。生水霉病的乌龟，应适当使用抗生素药物进行治疗。“保姆”无计可施，我只能硬着头皮上阵当起“医生”。早年，父亲得过后脚，我在医院全程陪他治疗，知道伤口清创处理的一套流程。我从药店买回头孢、酒精、碘伏和棉签。也许是好奇，女儿和外甥也凑过来，扶身的扶身，拽腿的拽腿。清理创面，人多好办事，而喂药却需要巧劲。乌龟也怕吃药。我拿药来喂，它就将头缩进壳里。我想到，假如人被捂住鼻子，是肯定要张口的。我先用两根棉签堵住乌龟的鼻孔，趁它张嘴吸气的一瞬间，迅速将两根棉签头插进它的口中，女儿稳住棉签，我再将药粉从龟嘴的缝隙中倒进去。

没想到，已经九十多岁高龄的祖父竟也心心念念牵挂着乌龟。他在我面前吵吵过好几回，说乌龟在阳台上的收纳箱里爬来爬去，像是急着找食吃的样子。我苦口婆心跟他解释，进入冬季它就不进食了，劝他不用去管。上了年纪的老顽童，有时会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话。那天，他趁我上班不在家，竟然将一袋父亲从饭店打包回来的海鲜和一瓶小尖椒，一股脑全部倒入收纳箱。他的好心差点酿成几只乌龟一命呜呼的惨剧。母亲发现后，边清理收纳箱，边将乌龟全部捞出放进水池。我分明看见它们在流泪。